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财经理管理名著译库



公益之重

富裕阶层如何兼济社会福祉

WHY PHILANTHROPY MATTERS

How the Wealthy Give, and What It Means for Our
Economic Well-Being

(美) 佐尔坦·J. 艾斯 著

李昆 李颖 译

ZOLTAN J. ACS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财经理名著译库



公益之重

富裕阶层如何兼济社会福祉

WHY PHILANTHROPY MATTERS

How the Wealthy Give, and What It Means for Our

Economic Well-Being

ZOLTAN J. ACS

(美) 佐尔坦·J. 艾斯 著

李昆 李颖 译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连

Zoltan J. Acs: Why Philanthropy Matters

Copyright©2011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辽宁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6-2013-300

本书简体中文翻译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授权的本书出口将视为违反版权法的行为。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益之重: 富裕阶层如何兼济社会福祉 / (美) 艾斯著, 李昆, 李颖译.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 4

(金融瞭望译丛)

ISBN 978-7-5654-1396-4

I. 公… II. ①艾… ②李… ③李… III. 公用事业-研究-美国 IV. F299.7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8851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217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教学支持: (0411) 84710309

营 销 部: (0411) 84710711

总 编 室: (0411) 84710523

网 址: <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 dufep@dufe.edu.cn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字数: 148千字 印张: 11 3/4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季 刘 佳

责任校对: 那 欣

封面设计: 冀贵收

版式设计: 钟福建

定价: 36.00元

本书简介

长久以来，公益事业一直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其在美国以及世界经济福利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公益之重》一书对公益事业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它是市场经济机制中被低估了的一股力量。书中衡量了公益事业对自由市场机制的关键性影响，认为美国公益事业能够为其他国家财富的生产性投资提供一个借鉴。佐尔坦·艾斯分析了公益捐赠带来的财富循环，指出这种循环有利于平衡市场经济。佐尔坦·艾斯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更丰富的市场经济画卷，展现出一面更准确的背景去思考政策，以此提振市场经济制度，为民众谋福祉。

艾斯通过研究自 18 世纪以来的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认为公益事业取得了三个重要成果。其一，它解决了财富的使用问题——占有财富，对其征税或者将其捐赠；其二，它在创造公共产品方面与政府互补；其三，公益事业通过聚焦教育、科学和医学，对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艾斯为我们描述了众多个人使用他们的财富来进行机构建设和知识推广，其中就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安德鲁·卡耐基、比尔·盖茨和奥普拉·温弗瑞。艾斯还提到，公益事业通过提升至关重要的力量——比如大学研究，让市场经济获得优势，而这些力量是技术创新、

经济平等和经济保障的必要条件。公益事业还能引导那些市场经济机制不够灵活的国家。艾斯以此为例，倡导一个更大的全球公益文化。

《公益之重》一书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视角，突出了经济进步、健康事业、美国的未来以及其他的广阔领域跟公益事业的重要联系。

作者的话

据说大大小小的发现都是历史的偶然，美洲的发现就是这种偶然之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在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时发现美洲的。本书的故事也不例外。1976年，我还在大学读研究生时，我的毕业论文试图从大型公司和大型工会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经济。我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钢铁工业，但同样适合于当时美国主要由大公司控制的几个行业。在研究通货膨胀时，我意外发现了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异常现象。

当时大的钢铁公司如美国钢铁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正陷入困境，同时新建的中小钢铁公司又不断从全美各地冒出来，和已有的钢铁巨头以及日本公司竞争。这本身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人们都普遍认为在一个经济体中，大企业比任何小企业更具有技术上和组织管理上的优势。这样，我就开始了一个有趣的学术探索之旅，研究美国经济如何正在从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转变。

在这个偶然发现之后的数十年里，我成了创业和创新这个领域的一个学生：大企业和小企业，低科技和高科技，美国 and 全球其他地区。大卫·奥瑞兹（David B. Audretsch）是我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我们相识于1979年。提着一个装满数据的手提箱，我们一同前往柏林，

试图破解大公司和小公司、创新，以及技术变化的秘密。和大卫多年来的合作以及他在学术上的洞见使我受益匪浅。

在柏林的 WZB（铁幕后的一个小岛），我和大卫部分解答了创业家正在如何改变美国经济以及政府正在如何有系统地瓦解管理型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这几十年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了小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什么小企业在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89 年我回到美国，到巴尔的摩大学任教，这是一段令人激动的时期。全球经济的创业热潮已经开始，美国则在引领这个潮流。企业家开始改变这个世界，信息革命已经全面展开。

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理查德·福罗里达（Richard Florida），随后我们就在创新和城市的重要性这个领域开始了合作研究。这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波士顿的 128 号公路和硅谷是当时信息革命的发源地，每个人都想了解这两个地区是如何引发这次革命的。随着大多数国家开始经济转型，人们开始探索通过市场的途径来解决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我和理查德，还有玛丽安·费尔德曼（Maryann Feldman）、阿提拉·瓦嘉（Attila Varga）以及李森永（Sam Yung Lee）开始共同研究城市和创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理查德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对我帮助非常大的同事。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在华盛顿待了 5 年。我先是在美国小企业管理局（U. 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作。对这个部门我并不陌生，在之前的很多研究中，我都使用该部门提供的数据。在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工作期间，我意识到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来支持创业型经济。管理型经济的政策议程已经相当成熟，但创业型经济如何运作以及政府如何对其进行支持却不太为人所知。在华盛顿，我遇到了凯瑟琳·阿明顿（Catherine Armington），我们随后一起在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工作了数年。对她其间提供的帮助我深表感激。

本书故事的第二个偶然源于我的老朋友，投资银行家安德鲁·凯彼

曼，他告诉我公益活动在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和创业活动同样重要的作用。他说：“看看耶鲁大学那些漂亮的建筑，它们都是由富人捐赠的。”对于研究者来说，问题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两个东西拼到一起。公益活动是如何与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融为一体的？这听起来有点像道家的哲学：明和暗，阴和阳。每件事情都有阴阳两面，因为没有黑暗，光明也就不存在，反过来也是如此。但在某一个特定事物上，其中的一面可能会表现得更强，而后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弱。

我对此问题很有兴趣，因此，正如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会做的那样：我去找与创业和公益活动有关的书籍。因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学者们应该已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了。由于对创业的文献已经很熟悉了，我就开始阅读有关公益活动的文献。在这个领域，我发现了涉及方方面面的大量文献，从富裕的个人到伟大的基金，但就是找不到任何将创业和公益这两个主题联系起来的東西。我越看越有兴趣，不是因为我发现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我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上，我遇到了一个老朋友和同事，我刚刚在这个会上对着一群反应冷淡的听众就有关该问题的一篇论文做了一个报告。罗尼·菲利普斯（Ronnie Phillips）是北科罗拉多大学的教授，他是美国制度主义学派的信徒，因此我就向他解释了我遇到的困惑。他对此非常感兴趣，我们随后启动了一个探讨创业和公益活动关系的研究项目。经过漫长的三年之后，我们对所想要寻找的答案有了基本的了解。虽然答案仍然非常粗略和不完整，但是开始讲得通了。美国曾经与众不同，但美国已经忘记自己曾经与众不同了。

在此基础上，瑞典皇家学院的庞特思·布劳纳希约姆（Pontus Braunerhjelm）和我开始合作研究该课题。我们在创业和公益关系上展开了若干项研究，将瑞典和俄亥俄州进行比较。将此问题放到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我们开始解释为什么美国经济比欧洲发展得更快。与此同时，麦吉尔大学的里奥·保罗·丹娜（Leo Paul Dana）和我着手研究中国的公

益活动。

2004 年，大卫·奥璀兹和我重返德国，在耶拿的马克普朗经济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of Economics）组建了一个创业、增长和公共政策研究室。人们都在探讨创业经济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是如何运作的，我坚信公益活动应该是答案的一部分。马克普朗经济研究所已成为理解 20 世纪创业的领先研究机构，为我们理清自己的思路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2005 年，我去了乔治梅森大学。乔治梅森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为我的研究真正打开了一扇窗户。在这里，我对“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公共政策学院的副院长罗杰·斯道（Roger Stough）对我的想法很感兴趣，对他的支持我深表感谢。我和公共政策学院一群非常优秀的研究生一起工作：Hezekiah Agwar、Mary Boardman、Pamela Miller、Joseph Sany、Nicola Virgil，以及 Vekataramana（Rama）Yananaudra。玛丽和拉玛作为研究助理，为研究近几个世纪以来企业家和公益家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我也曾接受堪萨斯城的尤因·马里恩·考夫曼基金会（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授予的一个高级学者职位，在那里我见到了该基金会的主席卡尔·施拉姆（Carl Schramm）。他是我遇到的人中第一位理解我的发现的重要性的人，并且和我一样对公益和创业在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持有非常相似的观点。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洞见使我受益匪浅。

2009 年，我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进行学术访问，这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系统地思考公益行为如何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我的同事伊尔科·奥休（Erkko Autio）和大卫·甘恩（David Gann）为我提供了理想的工作环境，对此我深表感谢。到了该年的夏末，我已经写出本书的初稿，感觉我开始将一个前人未知的故事串起来了。

2009 年秋季，玛丽·波德曼（Mary Boardman）和我花了一学期的

时间来研究英国和美国的慈善和公益行为，这对本书的写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的长期合作者和同事菲利普·奥尔斯瓦尔德（Philip Auerswald）要我和他合写一篇有关繁荣的论文。其间，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思考逐渐成形。

2010年夏天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研究，当时数十名美国的亿万富翁签名承诺捐献自己的财产。在2010年的秋季学期，乔治梅森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米歇尔·马卡多（Michelle McAddo）协助我将本书的内容加以整理，使其能够让更多的读者更容易理解。她提供的帮助非常宝贵。帕梅拉·卡拉汉（Pamela Callahan）和大卫·米勒的加入使我的研究团队进一步扩大，前者研究的是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共同发起的“捐赠承诺”（The Giving Pledge），后者在其毕业论文中将美国大学、创业和美国西进运动结束的历史结合到一起进行研究。

2011年夏天，我回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写了本书的第二稿。此时，我觉得我已经能够把创业和公益事业的关系讲清楚了。我想要感谢多迪·瑞格斯（Dody Riggs）和玛德琳·B. 亚当斯（Madeleine B. Adams），前者仔细校读了本书的多个修改稿，后者编辑了本书的最后一个修改稿并提供了建设性的帮助。

我还要特别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彼得·道赫蒂（Peter Dougherty），他立刻理解了本书的内容并将其导向一个更为凝练的主题——公益事业在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中被低估了的作用。将书稿带回这个中心主题，就必须增加一段对美国历史、美国政治和机会创造的更加详细的回顾。

我很高兴地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阿什利·艾克思（Ashley Acs），他对美国政治深入和广泛的了解使我受益匪浅，他不厌其烦地审阅了本书的多个修改稿，更正了其中表达不清和理解有误的地方，为本书定稿成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研究支持。他对本书若干章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帮助重新组织草稿，他良好的写作水平为本书增色不少。尽管阿什利还是一个研究

生，而我很久以前就已经是教授，但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的角色常常颠倒过来，我因此收获颇丰。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我还想感谢 Alan J. Abramson、Bo Carlsson、Leo Paul Dada、Jack Goldstone、David Hart、Kingsley Haynes、Jill Kickul、Zerb Laszlo、Connie McNeally、Jay Mitra、John Munkirs、Larry Plummer、Edward Rhodes、Mark Sanders、Siri Terjesen、Roy Thurik、Attila Varga、Thomas Vietorisz、Robert Wuebker，以及我在乔治梅森大学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同事为本书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为本书提出建议的还有 Imre Kovacs、Kevin McCarthy、Oliver Rothschild、Spencer Stacy 和 Tom Vander Ark。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简（Jane）和我的家人，他们在过去 15 年里不得不忍受我喋喋不休地讨论创业和公益。

目 录

第 1 章 一次谈话 1

1.1 公益事业和美国 4

1.2 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 5

1.3 结论 12

第 2 章 制造机会 15

2.1 四千年 15

2.2 美国 17

2.3 根本矛盾 19

2.4 早期的机会 20

2.5 制度的瘫痪 25

2.6 创新机会 27

2.7 补偿机会 29

2.8 结论 32

第3章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 35

- 3.1 为什么发生在美国? 35
- 3.2 自然边疆 37
- 3.3 创新的边疆 40
- 3.4 美国创新的新组织 43
- 3.5 管理型经济 47
- 3.6 衰退的证据 51
- 3.7 信息革命 53
- 3.8 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创新 56
- 3.9 创业型经济 59
- 3.10 为什么信息革命会发生在美国 60
- 3.11 结论 63

第4章 国家的财富 65

- 4.1 金色道钉 65
- 4.2 财富的问题 68
- 4.3 收入不平等, 极大的差异化 70
- 4.4 拿财富怎么办? 74
- 4.5 公益捐赠, 一项美国人的发明 75
- 4.6 慈善和公益 79
- 4.7 美国的基金会 80
- 4.8 公益和大学 85
- 4.9 公益的演进 87
- 4.10 结论 90

第 5 章 慈善和公益 91

- 5.1 我们为什么要捐赠 91
- 5.2 捐赠承诺 94
- 5.3 美国慷慨的根源 98
- 5.4 南方的传统：奴隶和贵族 101
- 5.5 志愿者的社会 103
- 5.6 大众公益 104
- 5.7 福利国家和公益的持久性 105
- 5.8 政治性公益 106
- 5.9 为什么是公益？ 107
- 5.10 结论 110

第 6 章 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 112

- 6.1 公益和市场经济机制 112
- 6.2 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的变迁 116
- 6.3 新镀金时代（1970 年以后的美国） 118
- 6.4 创新需要（走出萧条） 120
- 6.5 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121
- 6.6 普通人的需要（需要机会的人们） 124
- 6.7 为什么是公益？ 125
- 6.8 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是否有效？ 126
- 6.9 遗产税 128
- 6.10 结论 131

第 7 章 全球的视角 132

- 7.1 美国和世界 132

7.2 我们是谁	134
7.3 美国、欧洲和东亚	136
7.4 2050 年的世界	139
7.5 美国模式是否能够输出到其他国家?	143
7.6 结论	147

尾声 改变税法	149
----------------	------------

承诺信	153
------------	------------

第 1 章 一次谈话

一个有钱人如果到死还很有钱，那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安德鲁·卡内基

2010 年 10 月 3 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超级富翁将分享财产”的文章。该文章说的是“捐赠承诺”——一项由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发起的，号召全球最富裕的个人和家庭在自己有生之年将一半的财产捐赠给社会的活动。此项倡议源于盖茨和巴菲特在此前一年中与富翁们的交谈，倡议初始，就有 40 名美国亿万富翁签署了该承诺。这篇文章发表在签名的第二天，湮没在当天报纸刊登的众多消息里，起初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我预期该事件会很快被公众遗忘，就像此前十年中我跟踪过的一大堆其他有关公益事业的报纸和杂志文章一样。但这次，捐赠承诺的消息就像长了腿！在签字仪式后的三个月内，这是美国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到了当年年底，推特上 7% 的流量集中在该话题上。捐赠承诺激发了对公益事业这个话题的公共讨论，重启了关于公益事业在美国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争论。

很多签名者发表的公开信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公益事业家希望通过捐赠他们的财产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星球大战》系列的制片人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在捐赠承诺活动的网站上写道：“我捐赠自己大部分的财富用于改善教育，这是人类生存的关键。”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Paul Allen）写道：“我们将寻找能改变我们后代生活的新机会。”eBay的创始人彼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写道：“人们都有潜在的能力，但往往缺乏相应的机会……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为将来的人们带来希望。”

很多“捐赠承诺”签名者发表的公开信将公益捐赠等同于为人们创造新的机会。正如我希望在本书中揭示的那样，捐赠的循环——从公益捐赠到创造新的机会——在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是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要素。美国人捐赠财富的动力，以及他们慷慨行为的结果，都深深地植入了美国的企业家精神——这个制度既孵育了个人的创新，也支撑了每年超过3 000亿美元的私人捐赠行为。

尽管乔治·卢卡斯和保罗·艾伦等签名者慷慨解囊，但对“捐赠承诺”的许多公众反应是批评性的，人们对公益捐赠的动机常常持讥讽态度，并认为此举削弱了民主程序。美国《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读者攻击“捐赠承诺”是“哗众取宠”和“作秀”。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在其国际版中报道说：“一名亿万富翁抨击此举为‘很糟糕地将国家的权力转移给亿万富翁。’”然而，这些攻击是误导人的，因为它们没有认识到公益捐赠并不是什么新的时尚，而是源于我们的创业体系，并在创业体系中非常常见。

除了那些批评公益事业，认为它缺乏可问责性（accountability）的人外，其他人则质疑公益捐赠希望达到的目的。2010年取代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的墨西哥电信业巨头卡洛斯·斯利姆嘲笑“捐赠承诺”之举，他说：“慈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斯利姆本人就是一个公益事业家，但他质疑“捐赠承诺”的签字者所承诺捐赠的财富是否能带来任何可以衡量的